

137

今 日 評 論

期一 第三卷

時評

新年捷報（山）

美日商約的前途（長）

實施新縣制（予）

政治經濟化

物質建設現代化與思想道德現代化

集權與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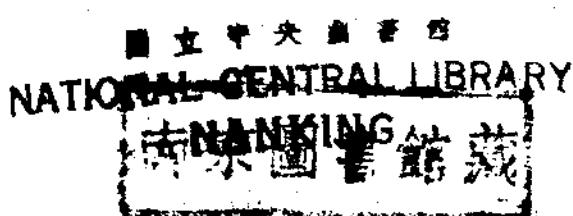
戲劇與批評

龐泉

亦此 柳無忌 王贊愚 賀麟 孫陳李

版出日七月一年九十二國民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號掛准特改華中



時評

新年捷報

在我們慶祝抗戰第三個新年的時候，各路傳來若干重要

捷報。這確是使我們興奮的消息。桂南的敵人，從陷南寧之後，猛力北進，希望能乘我不備，取柳州，以北迫桂林，西逼昭平，從而陷于八塘昆崙關之後，敵人的銳氣已呈再衰三竭的現象。昆崙關前後被奪我克已有兩次。敵人再奪昆崑關後，即分踞沿邕賓公路各要點，頑強抵抗。而我軍于平而側面同時發動猛烈攻擊，使敵前後聯絡完全切斷，所有各據點之敵，均為我擊滅，昆崑關遂于上月二十日再度為我克復。總計此役敵人之被殲滅者約在一聯隊以上，合舊江南岸被我圍擊之敵約有一個半旅團有奇，造成局部殲滅戰最成功之戰例。粵北的戰事，敵人于一月前，即就其在粵之二師團，一混成旅，及若干之海軍陸戰隊，加以近衛兵團，並調集潮汕及深圳方面之敵軍，分三路向韶關猛撲。及舊年年底敵人進至翁源附近，我伏軍突起，四面猛攻，激發兩晝夜，全線動搖，其中路近衛兵團有一聯隊，在良口全部被殲，左右兩翼，大為震動，倉皇南竄。我軍沿途加以包圍聚殲，總計前後傷斃敵軍一萬數千人，奪獲軍用品無算。粵漢南段之敵，至此遂告總崩潰。而我軍乃造成湘北大捷後的大勝利。桂南粵北的捷報是較為重要的。他如贛北、鄂南、湘北等處，我軍亦有局部的勝利。

總觀一個多月來的敵軍的動態，我們知道敵人最近的策略又注重華南，尤其粵桂一方面。因為南粵的失陷比較的快，敵人也許以為華南方面有機可乘，便頑力猛撲。此次粵北迎頭痛擊，足以打破敵人這個新的迷夢。在我們方面，我們除向前線將士致最大的敬意外，更應該因此而堅定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念。（山）

美日商約的前途

美日商約，到本月二十六日就滿期了。滿期後會不會成立新的商約？在新商約確定之前，會

不會有什麼臨時商約過渡？凡此種種都是關心遠東局勢的人所急待知道的。

日本的急於要和美國談判，是當然的事。美參院外委會主席畢德門說：他的對日經濟封鎖之是否即行提出，要看美日東京談判結果如何而定。截至目前止，東京談判毫無線索可言，是人所共知的。在此期間，日本玩了許多花樣，迫誘美國上他的圈套。去年末日本方面同蘇聯簽協，造出日蘇攜手的空氣，用意是聳動美國的視聽，但是美國人明白日本的用意，故並無日本所預期的反應。這一招花樣既不奏效，乃進而示小惠，揚言將開放長江。日方發言人說關於長江的開放，業已開始「真正」之準備。但是美國不是如日本所想像的大少爺一樣，經過多次的事實教訓，美國已充分認識日本只知道「堅強之態度與武力」。美國人已充分明瞭日本的真正目的是「驅逐白種於中國之外」，獨霸東亞。這一套花樣既又揭露，於是圖窮匕見了。美僑在華北，在上海又頻受日本軍人的侮辱，日本國內的報章開始激烈攻擊美國，反對開放長江。對於這一切的舉動，美國抱靜觀態度在看。紐約時報的意見至少可代表一部分美國知識之士的見解：「日本現在已成了美國最大的敵人。日本軍人統治者的慾望，是要驅逐白人於亞洲之外，為美國設想，應在美日商約到期之前，盡量抑制日本」。這就是說，對於國際強盜必須用懲戒方法來對付。現在全世界關心遠東問題的人都在期待美國進一步的動作，在最近三個星期內會有重要的發展，我們當靜心的期待。（長）

實施新縣制

近來中央對縣以下各級組織之調整，比過去任何時期更加注意。經過許多時的詳細研究，擬定了所謂「縣政改革方案」，嗣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先就五省擇定兩縣試行。去年九月間，國府頒佈「縣各級組織綱要」；近日行政院又通令全國各縣，自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實行。這項綱要的制定，是根據蔣總裁「改進黨務與調整黨政

關係」的重要演說，及各方人士多年的實驗結果。所以，最近六中全會，一認爲此一法案，乃實行憲政真實之保障，亦爲使中國造成近代國家必由之途選」。

今年國內的要政，是完成新縣制；如果認真實施；則基層組織必益臻健全。依據上述綱要以推行縣政，應與應革的事固多；但我們以爲此後改革縣制，其目標應是使省府指揮自如，縣府秉承靈敏，減少行文手續，增加命令效能。要達到這項目標，似乎首須探討現狀下縣政弊根所在。以往縣府組織之複雜，監督機關之繁多，縣府財政之支绌，其流弊顯然是法令停滯難行，

政治經濟化

陳岱孫

政府是否適宜于執行種種經濟業務，也許在理論上，還是一個熱烈爭辯的問題，而在實際上，近代國家之逐漸擴大其政府經濟業務的範圍是一個不可抹殺的趨勢。這一個趨勢，因爲近三十年來兩個大變動，驟然大爲增強。一個變動就是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還有一個變動就是一九二九年以後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是拿破崙戰役以後最大規模的戰爭，並且是第一次證明近代大規模戰爭，不但是兩個國家，或集團國武力優劣的比較，而是雙方經濟力強弱的比較。爲適應當時戰爭的需要，加強國內的生產，增進國內經濟機構的效率起見，各交戰國不能不放棄此前對於工業放任的態度。而由政府加以干涉，甚至由政府收爲公營，一九一四大戰結束後，雖然有些國家又恢復戰前制度，然而在多數國家裏，政府經濟業務的擴大已由臨時變爲永久的情形。一九二九年後的世界經濟蕭條又給這個情形一個新的激力。這一個階段的主要對象是金融與商業。一方面，過去自動的金屬本位貨幣制度，經戰後恢復的試驗，到此宣告破產，而國內經濟恐慌與國際金融制度復表現深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國際市場因世界經濟蕭條而萎縮，對外貿易不能不另謀增加輸出減低輸入的新途徑，於是金融貿易變爲

諸事越名避實。這種病象如今倘仍無法收拾，新縣制終難於完成。中央當局現既從事改進縣政，我們深望其能從嚴密縣府組織，提高縣長權限，及增加全縣經費做起。組織，權限與經費，三者互相聯繫。組織如能嚴密，權限才可運用裕如；同時權限如能運用自如，則經費必定無形增多。當然，實施新縣制之能否收效，主要關鍵仍繫於人才之質與量。一令行惟法，成效在人一，縣政亦莫能例外。縣政人員俸祿之微薄，訓練欠當，考核之懈弛，足使賢者裹足不前，不肖輩竽充數。中央當局在此亦應特加注意。（予）

南京圖書館

• 自由主義是單個人爲主體，國家是爲個人而產生而存在的。自由主義主張

個人之間要平等，而假定政治的平等可以造成個人間一切平等。所以自由主義於主張民治政體以求得個人政治平等之外，對於其他個人的行為，尤其是個人的經濟行為，主張採取放任態度。至於由國家代替私人來執行這些經濟行為當然更是絕對不在允許之列。在這些原則之下，國家的主要機能，如果不論是唯一的機能，是「警察」（極廣義的警察）。在政治一方面，這一警察機關在於保護個人的生命、財產、自由、福利等等。舉凡軍備、司法、警察（狹義的），衛生等等政務都是這一警察機能具體的表現。在經濟方面，這一「警察機能」是在於維持個人之生產自由，契約自由，競爭自由。國家是一個公正人，是經濟行為秩序或規律的維持者。這經濟行為的規律就是契約自由，競爭自由等等。只要個人的經濟行為不違背這些規律，國家總採取放任的態度。反之，如果個人的經濟行為破壞了這些規律，使得契約不自由，競爭不自由，生產不自由，國家就要出來干涉，而干涉的目的也就是恢復這些規律。在這些規律恢復之後，國家又退立一旁，盡他公正人，監視人的職責。例如工資的高低由勞資雙方磋商決定，物價的高低是由買賣雙方磋商決定。這是一種契約的自由。如果勞資兩方中的一方，能够利用特殊的情形，脅迫對方，成立一個單方有利的契約，或者買賣雙方中有一方能利用特殊的情形做成一個獨佔的狀況，契約自由，競爭自由的規律就被破壞了。在這個時候，國家就更執行「警察」的任務而出干涉。所以在自由主義基礎上，國家的主要機能是廣義的警察。而這一「警察機能」，在政治方面，是積極的，在經濟方面，是消極的。又所以我們對於國家的傳統觀念實在是一個較為狹隘的「警察國家」，而我們現代政治的機構實在不過是一個能夠運用這警察機能的組織。

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警察國家」未嘗不是一個正確的國家觀念，一個足以應付一般需要的政治機構。然情勢的演變已經逐漸否認自由主義的永久性。上述的趨勢是事實的證據。至於理由，也不是難于尋覓。自由主義假定在政治平等條件之下，如果生產，契約，競爭的自由能够維持，個人間

個人之間要平等，而假定政治的平等可以造成個人間一切平等。所以自由主義於主張民治政體以求得個人政治平等之外，對於其他個人的行為，尤其是個人的經濟行為，主張採取放任態度。至於由國家代替私人來執行這些經濟行為當然更是絕對不在允許之列。在這些原則之下，國家的主要機能，如果不論是唯一的機能，是「警察」（極廣義的警察）。在政治一方面，這一警察機關在於保護個人的生命、財產、自由、福利等等。舉凡軍備、司法、警察（狹義的），衛生等等政務都是這一警察機能具體的表現。在經濟方面，這一「警察機能」是在於維持個人之生產自由，契約自由，競爭自由。國家是一個公正人，是經濟行為秩序或規律的維持者。這經濟行為的規律就是契約自由，競爭自由等等。只要個人的經濟行為不違背這些規律，國家總採取放任的態度。反之，如果個人的經濟行為破壞了這些規律，使得契約不自由，競爭不自由，生產不自由，國家就要出來干涉，而干涉的目的也就是恢復這些規律。在這些規律恢復之後，國家又退立一旁，盡他公正人，監視人的職責。例如工資的高低由勞資雙方磋商決定，物價的高低是由買賣雙方磋商決定。這是一種契約的自由。如果勞資兩方中的一方，能够利用特殊的情形，脅迫對方，成立一個單方有利的契約，或者買賣雙方中有一方能利用特殊的情形做成一個獨佔的狀況，契約自由，競爭自由的規律就被破壞了。在這個時候，國家就更執行「警察」的任務而出干涉。所以在自由主義基礎上，國家的主要機能是廣義的警察。而這一「警察機能」，在政治方面，是積極的，在經濟方面，是消極的。又所以我們對於國家的傳統觀念實在是一個較為狹隘的「警察國家」，而我們現代政治的機構實在不過是一個能夠運用這警察機能的組織。

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警察國家」未嘗不是一個正確的國家觀念，一個足以應付一般需要的政治機構。然情勢的演變已經逐漸否認自由主義的永久性。上述的趨勢是事實的證據。至於理由，也不是難于尋覓。自由主義假定在政治平等條件之下，如果生產，契約，競爭的自由能够維持，個人間的經濟關係，就是處均等的地位。在這均等地位之下，個人的收穫，無論均與不均，都是公平。這一個假定，根據若干年來的經驗，未必可以成立。因為現在經濟制度之下，個人的經濟地位，大有懸殊。表面上，生產，契約，競爭，儘可自由，而兩造在磋商契約，履行競爭的時候，其所憑藉可大不相同。在此經濟地位懸殊之，個人經濟的機會並不均等，則生產，契約，競爭的自由非不是公平的經濟行為規律。國家只做一個公正人，維持這些未必是公平的規律，希望得到一個經濟公平，恐怕只是一個理想。然而近代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逐漸衰落由於此理論上的缺點者少，而由於實際困難者多。自由主義經濟以物價為樞紐，以為一切經濟現象行為都可以隨着這樞紐，以相互適應。所以雖然在表面上，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似乎無組織，而可以運作，但不無組織，而且不見一定能運行不紊。每若干年即發生一次的經濟蕭條就是我們經濟制度一個致命傷。固然我們現在還不能說明到底商業循環的真實理由安在，我們也不能說牠一定是自由經濟主義的附屬品，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牠是我們過去所實行之自由經濟主義的一個病態。再就管理論，私有經濟一向都是以效率自豪的。而過去每遇有重要變故，例如戰爭，政府為適應急需起見，常有徵收個人事業，由政府管理的需要。也許私人營業的效率是跟個別營業的內部，一扯到全局的經濟問題，這散漫的個人營業因為沒有些絡的作用，使失去牠的效率。近代戰爭既然是兩方整個國力的比較，而戰爭恐怕不是一時可以阻止的東西，則現代各國執政者當然不能讓本國經濟的發展出其隨興所之，而不加以注意。這種環境也不是當初在主張自由經濟主義者所認為理想的環境。再者，自由經濟主義還需要一個自由的國際經濟合作。這個實際的條件今日也不具備。國家經濟主義，在近三十年來，不但沒有衰落，並且與日俱長。而以經濟政策做國際政治的工具更是十二分時髦的辦法。只就應付而言，舊式自由經濟的機構已感捉襟見肘之窘，更說不上

積極的對抗了。所不論就理論上，或實際困難上說，舊式的自由經濟主義已走到窮途的階段，此後一貫的經濟史恐怕多少要渲染上一層很濃厚的計劃國家經濟的色彩。

我們並不是說計劃國家經濟是一服萬應靈藥，我們更沒有盲目于計劃國家經濟的種種可能缺點。如果自由主義經濟產生種種不公平的結果，壓迫與抵抗，階級的衝突，實際的困難計劃國家經濟到牠充分成熟的時期也未嘗不可以產另外一種的不公平，新的壓迫與抵抗，新的階級衝突與新的實際困難。不過這不是我們討論範圍之內。我們所注意者只是，無論為好為壞，國家的經濟機能一定大大的擴增。也許各國的情形與程度未必一致，而其趨勢恐怕無可否認。

在這新環境之下，我們對於國家的觀念當然必須改變，現在的「警察國家」的政治機構必須擴大，應付這新的情況。我們不能預測，我們對於國家的新觀念應該如何，因為這一看一個國家的經濟機能預備擴充到何程度。極端的情形是一個政府把現在所有私人經營的經濟業務一概收為國有經營，於是「警察」的機能乃變為政府機能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政府的機構更要大加變更擴大以執行此新增之任務。固然不見得所有的國家都有這個極端的轉變，然而轉變程度的深淺並沒有變更這問題的性質。如果狹義的政治任務是現代國家中心，則將來國家的中心無論在數量或重要上一定是經濟。

將來國家的機構有兩個主要的問題。一個是執行這些新機能內部本身組織機構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這些新機構相互的聯繫與這些新機構和現在「警察國家」已有政務機構聯合聯繫的問題。第一個問題，雖然也不是較為容易，而較有途徑可循。內部機構的健全，簡言之只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技術，另一方面是管理。在這兩方面，將來政府的經濟機構極可借鏡于現在的私人經濟組織。如果計劃國家經濟的規模較小，政府大部要模仿私人企業各種經營上所得的成法。如果計劃國家經濟的規模大，政府將吸收大部分私人的經濟業

進去，而變為政府機構的成法。在技術和管理方面，我們不相信改政府業務與私人業務有若何性質上之不同。然而在管理一方面，政府的業務確有一個危險。這個危險也是一般反對國家擴充其經濟機能的主要理由。因為沒有私人做推動力，政府業務的管理最容易衙門化。這也就是我們所說機構內部問題較有途徑可循。而不見的較為容易者。

這些新機構相互的關係與這些新機構和現在「警察國家」已有之政務機構聯繫離合的問題是新國家機構改造主要的問題。最簡單，而同時也是最不徹底的辦法，就是把這些新機構勉強附屬於現在「警察國家」已有之政務機構之下。如果計劃國家經濟的規模甚小，這個簡便的辦法也許可以勉強應付。然如果規模稍大，則在性質上，「警察國家」本不適于主持經濟事務，而在實際上，尾大不掉，一切事務恐怕難于進行。第二個辦法便是把新經濟機構與現在之政治機構完全分立。二者之間有一個聯繫的制度，而不互相附屬。第三個辦法便是根本改造現有的政治機構，是凡現有之各種行政、司法、立法的機構都加以改造，根據着新國家的觀念（各種機能重要的比較），以組織成各種新的機構。這三種辦法，何者最為適宜却是可「討論」的問題，而各方面的實驗也可以給我們以具體的材料。蘇俄或國家托拉斯的制度與意大利「法蘭國家」的理論都可以說是在這方面的試驗。這些試驗是否成功尚有待於時間的證明。然而我們是否能够，就理論上先治上述各種辦法以一個論斷，是可待有關政治制度者的討論與研究的。

我們近來盛倡經濟建國。在這個世界潮流的邊中，我們經濟建國的途徑，恐怕也多少帶有計劃國家經濟的傾向。我們的國家機構也是一個傳統的「警察國家」。如何變更這個「警察國家」的政治制度以成為一個新國家的政治制度，也是一般盛倡經濟建國者所應注意之問題。然而在中國，如何使國家經濟事業不衙門化官僚化也許是一個更切近的問題。

物質建設現代化與思想道德現代化

賀麟

作者根本認爲在今日的中國——新舊建國的中國，屬行現代化實爲首要的急務。而「現代化」的含義，我們又嫌一缺，說得太狹隘了一點。一般人所了解的現代化差不多就是商業化，工業化甚或機械化的意思。也有少數人在那裏談行政機構現代化大約是指行政機構法法治化而言。但最令我感覺奇怪的，所謂行政機構現代化大約是指行政機構法法治化而言。但最令我感覺奇怪的，何以竟沒有無人在那里談現代化的思想，現代化的道德？何以很少人倡導道德思想應力求現代化？我並且還要進一步追問，假如思想道德不現代化，單求實業、軍事、政治的現代化是否可能？

對於這裏所提出的問題，同樣的合乎常識，同樣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答覆，大約不外兩種說法：

第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大概是說，人類的思想形態和道德生活乃物質環境的反映和爲物質條件所決定。只要生產方式，物質條件一經現代化了，則思想道德即如影之隨形，立即不成問題地隨物質條件之現代化而現代化了。譬如，守時刻便是現代化的道德觀念之一。若只是空口宣傳人應當「守時刻」，實際上決不會有任何效力。但假如有鐵路的物質條件，則人便自然爲這鐵路所決定而遵守時刻了。因爲火車的開行是不顧個人的方便的。注重物質建設的現代化，而只是憑空去講思想道德的現代化，那就是陷於主觀的空想，不能把握客觀實在的說法。

不過這個表面上似乎很動聽，而且很切實際的說法，也有不少的困難。即以鐵路的例子而論，鐵路的管理，全靠人力。假使這些管理鐵路的員工不遵守時刻，或不認真管理，則這個鐵路，就會常發生誤點的事。又譬如，中國有幾百萬華僑散佈在外國，在美國的華僑尤其甚多。這些華僑完全居住在現代化的西洋大都市裏，但他們還是供奉的關聖帝君與財神，思想行爲可以

說是純全是中國式的。殊令人難於了解何以現代化的物質環境未能如影相隨般決定他們的思想道德。又如現代都市中的腳步，他們的物質生活可以說是早已十足地現代化了，而他們腦子裏也許全是些舊式官僚的陳舊思想，一點現代精神也不能代表。況且還有一個比較難於回答的問題：究竟因爲人思想上、生活上有了節省時間增加工作效率的需要，纔去求物質建設現代化，還是因爲物質建設自身自動地便現代化了，於是又由這自動的現代化的物質建設進而自然地又推動了，改革了人們的思想與道德。要解答這些困難，於是有一些揭露新哲學的人，又提出人類思想一方面是物質條件的反映，爲物質條件所決定，但一方面又能反作用物質條件。而這種新哲學其實仍然回到心物交感的舊說。這種舊說，只是一種常識的說法，並沒有多少學理的基礎。而且這種心物交感的舊說，每每爲舊式的神學家及唯心論者所利用。那知道這種新哲學反墮入心物交感的舊說中。至於物質條件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人類思想要被物質決定到什麼程度，思想方能對物質條件加以反作用。誰也不能加以科學的證明。其實心物交感說或心身交感說只是一種常識的看法。

殊乏科學事實和哲學理論的根據。說有形的物質可以影響或決定無形體的心靈已經够神祕了。說到了某種情形下，心靈又能反作用反影響物質，更是神秘難理解了。所以現在倘沒有一種專門科學，能够專門研究物質如何否定心靈的事實。也沒有一種專門科學在研究心靈如何反作用物質。足見那些開得甚寬廣上的物質條件決定思想形態論和那些心靈反作用物質條件的說法，乃至全不是科學的說法。說得如果平穩一點，尚可爲健康常識所容許。但假如這些本來契合常識的說法，爲政治的信仰，主義的口號所歪曲，那就成了一種有作用的武斷了。

至於對於我鴻首所提出的問題的第二種說法，大槩是認爲中國自新文化

運動以來，語言文藝、思想道德，早已現代化了。現在一般人之注重現代化

，皆是思想已經現代化之成效。現時中國所已有的這一點現代化的成績，皆是前一時期思想道德現代化的產物。因思想學術的現代化總是預為物質建設的現代化奠立基礎。清末人所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實即是單求物質工具之現代化，而不求思想道德之現代化。其所以終歸失敗，即由於不明瞭體用之合一而不可分性。「體」的方面，若沒有現代化的思想道德以植之基，則「用」的方面，徒生硬地輸入些現代化的物質工具，也絕不會消化利用而有成效。離開思想道德的現代化而單談物質工具的現代化便是空本逐末。

平心而論，這兩說法較之前一種說法，其合於常識，合於事實，恐只有過之無不及。我們難指出持此說的代表人物。但我想這應是大多數提倡新教育、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人所隱約抱持的見解。因為如果照極端的

下層決定上層，物質條件決定思想道德的人的說法，則我們所有這些學術機關文化機關，皆可一律改為工廠或實業機關，而將所有的一切學術文化思想道德完全聽憑物質環境，經濟條件去決定好了。因為我們可以不必從學術或教育下手以求思想道德之現代化，只須從物質生產之現代化着手即可決定思想道德使之現代化，豈非一舉兩得（單求物質生產現代化，而思想道德亦自然隨之而現代化，故曰一舉兩得）事半功倍嗎？然而事實上這些文化學術機關既不能改為工廠或實業機關，而且這些學術文化機關有其特殊的工作，獨立的使命，亦非經濟實業所能決定，所能代替。反之，認為學術文化思想道德之現代化，完全應從學術文化思想道德之本身着手，決無其他捷徑，乃是這些從事新教育和新文化運動的人的共同信念。而且這些倡導物質條件決定一切的人，每每並不是現代化的實業家、經濟家或工程師，而大都仍在那裏從事思想改革的工作，在那裏用此派的思想去推翻彼派的思想，以圖改變青年的思想。足見他們口頭上雖在說物質條件決定思想，而他們事實上所作的工作，仍然是以思想決定思想，以思想影響思想的宣傳工作，而不是以物質

條件決定思想的經濟實業的工作。

據我所知道，持思想道德爲體，經濟實業爲用的說法，對於現代的經濟實業或資本主義之思想道德的背境或基礎，加以充分的理論發揮和事實根據的人，當推德國新康德派的大社會學家韋伯（W. Weber 1864—1920 著有《宗教社會學及經濟史等巨著》）、英國人 R. H. Tawney 所著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一書，其內容幾完全韋伯的 *Religioussoziologie* 一書的摘要報告）。我願意先約略介紹韋伯的思想，然後再加批評。韋伯認爲近代的資本主義乃建築在一種「職業的倫理」上面的。所謂「職業的倫理」或資本主義的精神包括有下列各成分：一種以正確的科學原則爲根據的合理組織和管理的經濟企業。爲市場銷售而生產，爲民衆爲社會而生產，爲金錢的目的而生產，須有最熱心，最道德最有效率的勞動，也就是一個人完全盡忠於他的職業的勞動。

韋巴指出近代資本制度所包含的心理的和生活的態度，可用近代資本主義的精神之建設者佛蘭克林的許多名言上列證，如：「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金錢生金錢」・「信用秩序，信實，勤勉，效率，誠實，確實，和公正，係在任何領域，特別商的領域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如果沒有類似佛蘭克林所提出的這些思想和道德觀念，近代資本主義恐怕是不能實現的。近代資本主義之發展，足徵這些觀念早已遷移到西方社會和民衆心理了。

韋巴進一步指出這些代表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職業倫理發源於路得，和路得之現代化，完全應從學術文化思想道德之本身着手，決無其他捷徑，乃是這些從事新教育和新文化運動的人的共同信念。而且這些倡導物質條件決定新教及其行為的規則和實際的倫理之精神。當近代資本主義未發生以前，這些從事思想改革的工作，在那裏用此派的思想去推翻彼派的思想，以圖改變青年的思想。足見他們口頭上雖在說物質條件決定思想，而他們事實上所作的工作，仍然是以思想決定思想，以思想影響思想的宣傳工作，而不是以物質

予偉大的倫理的價值。新教崇拜勞動。新教首先提倡個人對於自己職業的工作之有秩序的，忠實的，熱心的操作，應當常作自己的神聖職務。使人放棄純粹的遁世思想，而回頭注意人間的而且是宗教的職務。新教又復鼓吹老實地賺錢，乃是上帝所嘉許的活動。簡言之，資本主義的精神，本質上即是新教的精神。章巴立舉了許多統計事實以證其說。他指出自宗教改革以後，經濟上居領導地位的國家，就是新教的國家（如荷蘭，英國，美國等）。至於天主教或非新教的國家，則殊落後。因為新教的「經濟倫理」的教育和對於人民的訓練，目的都在於使他們適合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新教的精神在於潤滑那很成功地建設和管理近代資本主義的企業所必不可少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據章巴立所得的統計材料。德國皈依新教的人民在經濟上比非新教的人民占優勝。而且他們的子女進實習和商業學校的百分率也比較高些。新教徒如法之Huguenots英之Quakers等，雖備受舊教壓迫，但在工商業上甚大顯興盛。

即在天主教徒素是富裕階級的國家裏也趕不上多半由較貧窮的階級集來的新教徒。

總之，章巴立的總結論，是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實現，並非由於物質的自動，經濟的自決，乃憑藉許多理智的、政治法律的、精神的道德的，宗教的條件而成。他叫做「合理的長時間存在的企業，合理的簿記，合理的技術，合理的法律，與夫合理的精神態度（Gesinnung），生活態度，和合理的經濟道德」。

從我們現在看來，章巴立說也許太偏，他所舉的統計事實，也許不盡可靠。但他却至少指明了實業經濟之思想與道德的背境。他並且昭示我們近代實業，去創造物質文明，才會產生近代的資本主義。至於他所說新教與經濟發達的關係也並不遠於事實。即以中國而論。職業學校最初大都為教會所辦。教會學校出身的學生，從事醫工及商業的人，恐怕也要多些。又如基督教回教的人，從事工商業的人比較多，相信佛教道教的人而從事工商業者，

似乎異常之少。而傳統儒教中人，大都以耕讀傳家，農業者占絕大多數，而工商業者比較少。足見宗教，和宗教的倫理，對於經濟實業的影響，實異常之大。所以，根據章巴立這種說法，要想產生現代化的經濟實業，不僅須先有現代的思想和倫理，且須先有現代化的宗教為前提。

至於章巴立的困難，據我個人意見，至少有兩點。第一，他太偏重新教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的決定力量，幾乎有替新教作宣傳的嫌疑。他把近代資本主義的發達，完全歸功（也可以說是歸罪）於馬丁路德及喀爾文等少數宗教家，未免太抹殺了許多大發明家，實業大王，科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等對於資本主義的貢獻。這與把中國近年的現代化的建設歸功於少數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把歐洲的大戰，歸罪於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尼采的超哲學，皆同是無甚意義不合事實的說法。

第二，章巴立只是就事實立論，未能指出思想倫理與經濟實業的邏輯的必然關係，既就事實立論，則新教的經濟倫理影響經濟實業的發展，與經濟實業影響宗教的改革，和倫理思想的變遷，均同樣即是擺在眼前的事實。章巴立如果取忠於事實的科學態度，即不應偏重一面，而完全抹殺其他一面。

根據對於上面兩方面的批評，我願意簡略地提出一些中和的見解如下：

一、就事實言，也可以說就常識言，但不能認作科學的理論或哲學的學說，經濟實業可以影響（不必用「決定二字」）思想道德，思想道德亦可影響經濟實業。但被動的為經濟所影響的思想道德，非真正的有意義與價值的思想道德。反之，為思想道德的努力所建設的經濟實業，方是真正的經濟實業。不然，未經過思想的計劃，道德努力而產生的物質文明，就是貴族的奢侈，貪污的贓品，剝奪的利潤，經濟生活之病態。

二、就哲學理論言，精神與物質乃同一實在之兩面，經濟實業與思想道德乃同一社會生活之兩面，不能互為因果，互相決定。為研究方便理論系統，可以說，心為心因，物為物因。思想決定思想，經濟決定經濟。哲學家不能解決經濟實業工程方面的問題。實業家也不能解答哲學上的專門問題。

即若非所謂桃樹不能開李花的道理。一個哲學思想可以使國富兵強，一個實業建設可以產生偉大的哲學系統，皆是不可能的奇蹟。

三，就思想與道德的本質言，思想為理性的規範所決定，而不受物質條件的決定。為物質條件所決定的也許是感覺、意見、情感，而不是理性的思想。真正的道德行為為自由的思想的考慮所決定，而不受物質條件的決定。為物質條件所決定的行為只是被動的、茫昧的、奴役的行為，非真正的足以發展個性擴充人格的道德行為。

集權與民主

——一年來國內政治的動向——

近一年來，中國政治可說是朝兩個方向走，一面力求事權統一，指揮靈活，以期增進行政效率，適合戰時需要；一面又積極團結全國力量，使人民有更大之自由，與更多之參政機會。前的傾向，姑稱之「集權」；而後的傾向，則稱之為「民主」。為抗戰要實行「集權」，為建國要促進「民主」，這中間存着絕對的聯繫性，絲毫沒有衝突。戰時需要強有力的政府，而強有力的政府，又不能不有人民力量為其後盾；所以我說「集權」與「民主」，在此時似相反而實相成。抗戰第一期中，這兩種傾向，大體上已經同時出現，但到了最近一年，更有顯而易見的進展。

試先言「集權」。

蔣委員長對於第二期的抗戰，有着極重要的指示，這就是「政治重於軍事」。在第一期抗戰中，因為政治與軍事脫節的關係，使戰局發生於我不利的變化。因此近一年來，我們當局從事推動政治趕上軍事。其實，戰時所謂「政治」，首重行政，而行政如何能與軍事配合，這是當前待決的問題。國家在戰時行政上，貴乎求權力之集中，及行動之敏捷，以謀應付急變。欲達自如，這幾成了一定不易之理。

關於機構的調整，在抗戰之始，中央已着手進行；而最值注目的，是二十七年一月中央行政機構上的調整。行政院各部會及軍事委員會各部會，均

四，就經濟實業的本質言，經濟實業乃道德努力的殿樑。德雷Munsterberg 說實業乃是一種 *ethical achievement*，實值得我們深長思的不易之論。

五，就學術文化的提倡言，各部門的文化學術事業均應分功合作，各自分頭去求自己所從事的那一部門之現代化。實業經濟應現代化；軍事政治也應現代化；思想道德也應求現代化。各人要站在自己的崗位努力從事於本分內的工作之現代化。軍事家實業家不必坐候思想道德之現代化以作指導。思想家科學家也不必企望經濟實業的現代化來現代化青年的思想與道德。

王贛愚

已合理的歸併，職權的淆亂不如從前之甚。表面上，黨政軍之間，雖有密切的聯繫，但尚未能融成一體，以致促成戰時機構的不緊湊和不靈活。到了二十八年年初，我國又進入黨政軍大整理的時期。此時召開的五中全會，議決在抗戰期間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之指揮，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職權。就組織上言，該會以國民黨總裁任委員長，以五院院長、外部部長、軍委會正副參謀總長、及中央常委三人任常務委員。就職權上言，中央黨部所屬的各部會，以及國民政府五院軍委會所屬的各部會，悉歸國防最高委員會指揮；而且這個新設的機關為企求機構的靈敏，效率的增加起見，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不必按平時程序辦理，得以命令便宜行事。國防最高委員會之迅速設置，實為一年來我國政制上的最重要改革。抗戰已到了第二時期，領導軍事之首腦部分，自應充分發揮效能，以便當機立斷，應付一切。國防最高委員會，係顧慮這種需要而產生；就其人選及組織觀察，確能加強黨政軍之密切聯繫，而使整個國家機構非常強化。這是值得我們稱道的。二十八年「集權」的趨勢，又因领袖地位之增高，更得健全的進展。軍事最高統帥，本早為軍委會的蔣委員長；自廿七年四月臨全大會修改黨章，設置總裁後，黨權又內而集中於其身。翌年，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復以總裁當然為其委員長。本屆六中全會開幕後，蔣委員長不辭艱苦，又兼任行政院長，於是黨政軍三者均在統一指揮之下，各盡其抗戰之效能。不過，從另一方面觀察，現階段政治上，還存着一個莫大矛盾，這就是黨政軍人大

權既已高度集中了，而中央政治機構雖透過調整，仍是顛複零亂，其流弊則職權相混，責任不明。欲澈底實行集權，似不能認現行機構為已完滿。本屆六中全會又通過「加強中樞機構」一案，規定社會及衛生署改隸行政院，貿易局或一部，農林水利亦成一部。這是調整機構上的再度企圖。坦率地說，現行中央機構為求全計，仍有深度改革的必要。過去情形不必講，最近一年來政府新添機構甚多，其組織似乎一樣重複，其職權似乎一樣矛盾，我們祇希望在新年的開端，當局正名覈實，再加調整，以收政令統一之效。

以上所論，詳於中央並忽於地方。然行政集體之趨勢，近一年來在地方也有具體的表現。譬如行政院議決「戰區各省省政府設置行署通則」，許戰區各省於必要時設省政府行署，以省政府委員為主任，下設秘書、政務及警務三處，或其中之一，或二，以代行省政府職權。再如政府為統一職權及推進效率起見，曾經通令規定各省行政督察專員，一律不兼縣長，但仍應兼任區保安司令；專員公署與保安司令部，向係分別設置，近已由院核准合併組織。又如行政院頒佈「戰區各縣政府組織綱要」，賦予戰區各縣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權。總之，抗戰軍興以來，戰區日益擴大，各地方行政組織，勢須重加調整，適合戰時需要。至於縣以下行政機構之調整，近一年來當局亦會有整頓之舉措，國府於九月十九公佈「縣各級組織綱要」，將來如能實行，則基層組織必更臻健全，這是毫無疑義的。

其次，機構雖已調整，但人事還未滿人意，亦為行政效率的障礙。在此時，政府在積極方面，固應厲行考試制度，羅致全國人才，共襄大計；但在消極方面又當剷除不良政風，懲治貪污失職，以提高行政效率。關於戰時人事的調整，在這一年內，除考試院舉行高等考試外，中央社會部又居然發起組織所謂「戰時人才調濟協會」圖謀「解決戰時人事配合問題」，俾使人盡其才，事盡其功」之效。這一措施確為適切機宜的。至如嚴懲貪污一端，政府迭經三令五申，對於違法失職官吏之懲罰，多較原有刑法懲戒法為嚴。國府於二十七年六月有「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的頒佈，在近一年內復屢次下令整飭吏治，告誥公務人員，務各「尊重法紀，砥礪廉潔」，足見當局在抗戰期間仍不忘培植政風的重要。此外，同年十一月間，國府又頒佈「公務員服務法」代替舊有的「公務員服務規程」，這一類整飭吏治的法令能否生效，當然祇有看政府有否切實執行的決心。要使政治能趕上軍事，我們非從改善人事入手不可。因此我們希望自二十九年起，當局能在這一方面雷厲

風行地做去，這樣對於政治的推進，定有很大裨益。

再言「民主」的傾向。

近一年來，全國上下，都在力求加緊政府與人民間的聯繫，使政府法令得以更迅速更切實的執行。欲如此，則設置民意機關，是急不容緩的。原議召開的國民大會，因抗戰軍興而延期，乃於抗戰週年紀念之日，成立了國民參政會以為戰時之民意機關。這個機關非但能此時收集思廣益之效，而且能在此時能替國家樹立民主政治的規模。在現制下的國參會，姑不論其產生方式如何，也不問其職權大小如何，如果人選得宜，運用得當，亦可使政府與人民由此溶成一體，開政治統一的新局面。

國參會第一次大會的最大收穫，是使「抗戰建國綱領」得到全體一致的熱烈擁護，表示我們的統一，加強我們的團結。第二次大會在這項綱領之下，更進而注重各項實際問題，結果也很圓滿的完結了任務。近一年來國參會任期延長，又開過兩次大會。在第三次開會時，最值得注目的，是若干參政員的「確立民主制度」的提案。此項提案內容，共舉理由六點，共提諸三點，而其結論則主張改善增強現有的國參會，使能代表人民為民衆服務，並用漸進的方式，使之具有監督行政的權利。在這次大會閉幕詞中，蔣長蔣會會有整個的審議，國府於九月十九日公佈「縣各級組織綱要」，將來如能實行，則基層組織必更臻健全，這是毫無疑義的。

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召集國民大會一案，並在後，即由諸長依照該案所定辦法，指定參政員組織「憲政制成立」，督促政府促成憲政。

建國在抗戰中開始，而實施憲政是建國必經的途徑。中央體悉輿情，毅然採納國參會的憲政議案。依照六中全會議決，國民大會召集的日期，已定為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其任務為制定憲法，並決定施行日期。國民大會原來因為抗戰的展期，現在又因抗戰將成長期局面，乃決不再事遷延，致達衆望。在抗戰期間召集國民大會會議，本是十分困難；幸虧國民大會代表，在民二十五六年已由各自市選出了四分之三，其餘四分之一現在仍須續選。此中縱然有若干難處，然當局果真處以至公至誠，則亦不難迎刃而解。照此看來，在既定期限內，各種選舉當可趕辦完竣，最重要的還是盡量糾正兩年來選舉所患的弊病與缺點。

這一年來國內的「民主」傾向，又由各省市參議會的成立，而更充分地

表現出來。二十七年八月間，國府頒佈「省市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以後，即通知各省市定廿八年一月一日為參議會成立的日期。在此短促時期中，許多省份或因情形特殊或因籌備不及，未能如期設立。但在這一年內，各省市參議會已經成立者，計有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浙江、福建、江西、安徽、青海、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山東、甘肅等十六省及重慶一市。省市參議會，就其目的言，與國參會相彷彿，是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而設。該會雖不能與普省或州議會相比擬，但在此時却算是我國促進省（市）政興革的民意機關。就其職權上言，對於施政方針行使決議，建議及詢問三權以外，省市參議會對於未經省政府執行的諸決案，如經次期集會三分之二維持原案或修正原案時，還有權督促省政府付諸實施（除呈報行政院核准免於執行者外）。這種職權為國參會所未有，如果運用適當，定會發生很大的效能。

然而，有些人對於地方參議會的設置，自始就發生了疑惑，以為在此戰事緊急時遍設民意機關，不但有碍事權集中，且會惹起意外紛擾。我們看法

却不盡如此。戰時固不必添設旁枝機關，但絕對不可缺乏溝通人民與政府的民意機關。在現制下，省（市）是地方機柄的最上一級。國家許多建設事業，實際上必須聽各省建議，其職務之重大，當可以想見了。從經驗上說，在近一年內，各省市參議會，對地方當局的施政，隨時與聞，已能使法令與實情融會貫通，溶成一片。我們敢信這個組織對抗戰建國工作，均有莫大的幫助。

綜上所言，最近一年間，我國政治在「集權」與「民主」交流並進中，確有著飛躍的進步。「集權」與「民主」雖似是兩種不同的傾向，但到了戰時，又需要「民主」，而「民主」也只有從堅決抗戰中，纔能容易實現。當然，這一年來，我們在政治上之所以能有這樣的進步，無疑的是由於國內統一與團結的形成。統一與團結，雖早已實現於抗戰之始，但當時還覺不足，隨着戰局的演進，我們仍在企求意志之齊一化，行動之紀律化，今後果能不斷地向着這一方面邁進，政治與軍事配合問題，在以後是不難解決的。

戲劇與批評

柳無忌

話劇的興起，在中國文壇上僅有短短的二二十年歷史，實際上劇團的組織，話劇的演，觀眾的普及，更是晚近的事，在抗戰前幾年始做出一點成績來。話劇從舊劇中解放出來，她起始自書本搬到舞台上，有一個職業的根蒂，得到了羣衆，抗戰就來臨了。但是這個神聖自由之戰，並沒有撲滅了正在滋長中的話劇運動，為一股熱烈火焰所激動的青年，他們在抗戰的旗幟下擁戴著劇運向前邁進。抗戰的戲劇繁榮起來了，她大量的產生着，普遍的演出去。這似乎是一個奇蹟，但實在也是自然的趨勢。她充分的表現出戲劇與社會的密接。一方面，話劇的歷史尚淺，另一面，話劇的前途又無限量。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批評標準，作為寫劇的基礎，作為指導劇運的南針。這個標準可以在戲劇與人生的關係中尋求出來。

先從人生與文學說起。英國批評家亞諾德曾有過一句話，詩是人生的批評。詩既如此，其他文學何獨不然？這句話的至理，在于把平常我們所認為文學乃人生表現的理論，更推進一步：文學不僅反映人生，更從而批評之。

•這是我們希望文學所做的一種積極工作。我們希望將來要到一個地步，使文學不可離人生，人生不可離文學。後者似乎不是普遍的現象，有許多人們對於文學無緣。讓我們這樣說吧，這是他們自己的缺點，生活上的一種遺憾；而且，倘使那些人能够培植一些文學的修養，他們的生活將更豐滿，他們的人生觀將更完備。同時，我們看見相反的有一般反對文學之士，他們不懂文學無功無利，最多不過一個虛名，却苟且。誠然，學于創作，這可見文學有其迷人的魔力！——這吸引力的起源即：因為文學與生活有緊密關係。

文學中最接近人生的是戲劇，戲劇最合適于人生的批判。戲劇為什麼能親近人生？要明瞭這點，先應明瞭戲劇與其他文學的區別。簡單的說，戲劇不同於小說詩文，因為她不僅是寫着，讀着，她也是寫着為演出的。

一部成功的劇本，一定可以在舞台上排演。倘使戲劇而不能表演，她是詩劇，她屬於詩曲之類而不屬於戲劇。劇本的上演是戲劇最大的顯明特點。戲劇是動作，其他文學僅是動作的描寫與敘述。希臘人明乎此上，其一

「戲劇」的意義就是「動作」。在舞台上許多人演着，動着，說着，那不是動作是什麼？讀小說史詩時我們用眼睛想像動作，觀劇時整個的動作顯現在我們的視前，舉凡演員的一步一語，都直接的感應在我們的神經系上，當然我們倍覺戲劇的新切了。戲劇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牠是用全部對話構成的。

在近代小說中，對話仍佔重要地位，但不比戲劇那樣沒有對話不能成劇。對話在劇中可分為獨白、談話，及對話。此外尚有賓白等等，可謂極盡變化的能事。在台上每一刻有對話，有動作，戲劇真可稱為動的文學，好如其他種文學均是靜的文學一樣。古代有行吟詩人，史詩與歌曲都是朗誦的，現在連吟詩的風氣都要提倡，由於印刷的發達，有許多人是看詩而不讀詩的了。再談，戲劇是合作的文學，不同于詩歌小說是個人的文學。此種合作的精神在演戲時完全表現出來。一個劇本的演出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作者，演員，導演，化裝員，舞台監督，以及許許多多次要的幫忙人員。排戲本身即是一幅人生的寫照，熱鬧的，亂閑閑的，充滿了社交的意味，這與小說詩歌僅限於作者的搖頭弄筆，或一人的機械式的排字，校對，裝訂，不可同日語了。

在動的合作文學中所表現出的，乃是活躍的人生。固然，這人生只能是一小部份，或可一管人生的剪影，但偉大的戲劇往往能得其精髓，肖其輪廓。而且，劇作家可以寓表現於批評。一位風景畫家從多幅自然的景物中選出一幅最美麗的圖畫繪在他的畫布上，同樣的，一位有天才的劇作家知道如何從人生萬千的變幻及錯綜的關係中取出一部份最精彩的動作，搬演在舞台上。這個人生的故事，由於取材的得當，編排的巧妙，全昭示出事物的因果，環串的影響，人類的接觸。莎士比亞以為演劇的目的，自始至今，乃是為自然寫照，自然即是人生；同時，戲劇更須表現德行的相貌，卑鄙的印象，這是我們所談的人生的批評了。

戲劇與人生的連繫明白後，反過來看，我們亦應以人生批評戲劇。我們要從新為劇評估一個價值，定一個標準，而人生即是評斷的大好標準。這意見並不新穎，却是切實。在歷史不長的中國的戲劇運動中，我們尤應找出這樣一個評衡的論理，作為戲評的出發點。當一個觀劇者看完一齣戲後，他不必問這劇是否合於批評家的規律，或名作者的模範，他不必競競于戲劇的歷史及理論，他應當用一種常識的態度問着：有多少真實的人生在這劇中？是怎樣的人生？是怎樣的社會意義？從這些問題的答覆中劇本的價值估定了。

普通的說，我們可以從三方面把人生作為戲劇的評衡：一，劇情；二，

人物；三，對話。這三者是構成劇本的要素，是批評時所不能不顧及的。希臘大批評家亞律士多德說得好：「事是戲劇的靈魂。」可見故事在劇中的重要。問題是：那樣的故事經得起人生的批評？浪漫的時代過去了，新浪漫劇的復興僅是曇花一現。現實的生活是如此的逼切，牠不容許人們再徘徊於過去的追憶，神奇的迷惘中。就是浪漫的故事也得合乎現實的條件；就是歷史的演出也得適應今人所知道的過去生活。劇作者運用想象力構造一個故事，可是他的劇情必需彷彿現實，使觀眾看了不覺其真假，暫時消失疑惑之心，以為實在是一片千真萬確的人生。劇情而能引起這樣一種的真實感，尋人們對於生活有新的觀念，新的刺激，新的疑問，那麼這劇已是相當的成功了。

從西洋戲劇史上看來，描寫人物的演進有三個階段：最初是英雄式的人物，然後有理想的以至現實的人物。古代希臘劇中的人物是如此進化着，近代劇中的人物也是如此。到了最近的幾十年，在自然主義的薰陶下，劇中的人物除了少數例外可說是完全為實所支配。巴雷有新浪漫主義的色彩，奧尼爾回到希臘三部曲的作法，但是他們所表現在舞台上的角色還是活潑潑的二十世紀的男女，或少數十九世紀未葉所剩下的老前輩。中國的話劇是一個新興的產物，牠沒有傳統的觀念，牠當然更應把現實的人生作為基礎，描狀着一羣新中國的典型人物，但是我們不能把典型與公式相混，我們的人物描寫絕不可公式化，以至千篇一律。這類的人物是死的，木乃伊式的；而我們評劇的標準要求有活的多方面性格的人物。劇情既然要確肖人生，劇中人物亦當從真正的人生中找出例子來。

倘使故事是戲劇的靈魂，人物是牠的軀體，那末對話是牠的服裝。軀體應該是靈便的，活動的，服裝呢，却不可事事奢侈，因為華麗的服飾反不自然，徒有其外表。戲劇對話的用韻正如女子穿高跟鞋，走起來有節奏，神氣活足，然而太矯揉造作，妨礙着行動。無韻體在現代劇中亦不多見，僅是少數人為滿足一己的興趣而寫作。所以戲劇回到了牠自然樸素的服裝，日常的語言。現實的人生與活的人物，需要一種日常的對話，每天所說的聽到的日常語言。但是我們要避免一般的誤會，以為劇中對話可以隨便寫着。好像服裝雖應樸實，但亦需合于身段，不能太長或太短，太肥或太瘦。對話亦是如此。牠應該適宜於每個人物的個性，恰如其年齡，地力，及環境。戲劇家辛基為描寫愛爾蘭的農民生活，在當地的羣島上住了多時，學習一切人情，風俗，語調，然後他的劇本達到了一種真實的人生味兒。這是善用對話的效果，對

話劇作選擇，經濟，提示力，這幾點自易卜生以來已成爲劇作家的天經地義了。

戲劇與人生的關係既有定論，牠對於社會的影響亦是很大，所以牠有宣傳的力。因此我們不得不談到戲劇中藝術與宣傳的關係。一部劇不必在技巧上有相當成就，因其藝術的完美，始能有宣傳的功用。談劇不能不談其技術。好似木工，鐵匠，廚子等行，各有特殊手藝，劇作家也獨有的有他的技術。寫劇並不是容易的事，但也不是困難的事。不容易的地方，是因爲這是專門的工作，不是輕率從事，一舉成功的；不困難的地方，是因爲如果作者能有相當的練習修養，熟諳技藝後，即可運用自如，隨心所欲。近代劇作家如易卜生，蕭伯納，都是造劇太匠，他們雖不重藝術，而他們的劇本已是無上的藝術珍品了。

藝術是文學創作的首要條件，但是技巧的熟練不一定能使作品偉大，一部有價值的名劇是含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十八九世紀歐洲各國有所謂「好劇本」出現，其所謂「好」者，即指舞台的技巧方面：動人的故事，巧妙的結構，有趣的人物，輕鬆的談話，在演出時無一處不使觀眾得到滿意的娛樂。然而戲劇的目的不只是娛樂，戲劇的價值不僅在藝術，唯美論已成爲過時的文學論理，爲藝術而藝術的學說更不能引用於以人生批評爲出發點的戲劇。戲劇固然是一種藝術，但亦有牠對於社會的功用，牠是一種宣傳，但比其他文學更有宣傳的力量。依照蕭伯納的看法，劇台直是一個講壇，在那裏借着

劇中的角色作者現身說法。其實劇台比一個傳道師的講壇更能號召和影響聽衆。戲劇寓教訓於娛樂，牠有濃厚的興趣，使觀劇者不知不覺中受着感動。牠引起同情或厭惡，愉快或悲哀，恐懼或憐憫。在聽衆心弦上所激動的情緒是不可磨滅的，牠如一顆種子，將有萌芽的日子。在劇台上演自的一舉一動，酷如人生，有真切之感，較他種文學之僅憑藉想像者有更大影響。戲劇的宣傳普及於一般大眾。不好文學的人們能欣賞劇本的演出，即是目不識丁的羣衆亦能被戲劇所激動而涕泗橫流，或放聲大笑。怪鄉下人見了劇台上曹操那樣的奸相，誤以爲真，要攘臂而起，撲除國賊了。

這項宣傳的潛力我們要好好的利用；在抗戰時期戲劇已成爲有力的宣傳工具。我們看了一張標語，只覺得白紙上幾個黑字，過目即忘；看一幅漫畫或木刻，有時會思索一下；看一篇小說或文章，在腦中起一點感想；當我們看到一部成功的劇本在舞臺上演出時，因爲這是真實的人生的片段，能得着深刻的印像，永永的存在心中。憑着這個理論，我們應該鼓勵抗戰劇的寫作及上演，我們亦相信劇本的技巧與內容有同樣重要。有了好的技巧，始能得到最大的感動能力，最有效的宣傳作用。在抗戰期話劇的興起不是偶然的事件。從話劇的最初階段，我們已渡到一個過渡的階段，抗戰給了牠新鮮的生命，熱誠的激動，確切的目標，前進的方向，只要我們能堅強地把握住戲劇與人生社會的相互關係，我們可以斷定的說，待他日勝利的光明來臨時，我們將見劇運領導着牠文學走入一個偉大的時代。

鹿 泉

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第二個月的一個黃昏。我和我的三個準備投軍的伙伴，同在正太路鹿泉車站候車，打算穿過太行山的有着不調和的輕佻名字的娘子關，然後轉到荒山重疊的晉北去。

修鐵車人空落無着的頭腦般的，又乾枯又冷漠的赭紫色的烟霧，玻璃框上下品的西洋畫裏的雲彩似的，拉成單調的平行線。稜角嶙峋的瘦鹿山，背依着濛水光色的天空。車站外參差的黃草和已經搖落的洋槐跟榆樹林，翹出搖擺的枝幹和莖子。原野被高粱的殘莖和起了紅斑的大葉子鋪滿，到處是褐色的。車站外面新修的公路翻起新鮮黃土。爲防空壕挖起的土所污染了的小票房，顯得殘破而且荒涼。

單薄的衣衫，已耐不住晚來的涼氣。我和我的伙伴志願肩頭靠肩頭，縮

亦 此

住時子操着手，坐在我們共有的相當大的行李捲上——那是我們從他家裏帶出來的——另外的一對愛人，在月台木欄旁擠在一起，低着頭，又走又談。在危急中才感到愛人們是自私的。

由保定府逃難來的一些難民，大半還是逃難得起的。等車已等得麻木了似的，和行李的堆擋在一起，東倒西歪。由各別的堆擋便可以分別出是各別的家庭。嬰孩們無聲地吮着母親特別留心掩蓋着的奶頭。細頸流鼻涕的小姑娘，猶似地偎在大人們底衣襟後面。

車因了石家莊的轟炸，已一晝夜沒有消息。

一種茫然的哀愁融在黃昏裏。

此地離目的地還有六百多里。夜裏也許還沒有車來，有車也未必允許給

我們坐。或者人們一高興也許把我們這流亡客扣留……我們不斷想這些，因為牠只會破壞我們底憧憬的。可是這時候，我們除掉這肥皂泡似的憧憬，連肚皮也還空着呢。

「你會騎馬嗎？」我問伙伴，吐了吐嘴，短的肩膀又拖向下了。因為兩

烟的陷落，門齒更顯得伸在唇外了。他似乎漫不經意地問我。

「會的。」我說。「小時候，在家裏放牲口，常騎過！」

「那好極了。」他有些羨慕似的，眨着眼，睫毛在昏暗的幽光裏閃動着

。「可憐我不會打遊擊要騎馬。」

「只要有馬，放開祖子學便會，沒有三天『力把』。」

「學一學的。」他肯定的說。「……把槍橫在肩上，扯起馬嚼，兩脚一

踢馬肚皮，爬上太行山，再爬上那狗頭八怪的石峯，往下一看，一片平原，綠油油的青紗帳，那就是我們的老家……」

他中止了說話。我雖然沒有看他，却覺到他的臉色如同晚間的棉花糖似的又並攏了。他分明又想起淪陷了的家鄉，和不知所測的女人和妹妹。

天色越發暗了，山背後暈起廢指色的邊緣，山似乎伸直了腰，巍然的站在我們和山西之間。

山頭上空閃着銀色的星。

「你從前來過這裏嗎？」我問他。

「來過，同小朋友們來逛過抱犧山，鹿泉。這裏名字叫獲鹿縣。」靜謐往往使受難者特別難耐的，秋，給人們添重了淒怨。我很想聽聽足以配合這情調的故事。我的伙伴，不等我請求便開始了。

「這當然是本地傳說——從什麼時候起呢。你知道封神榜上的王翦吧？

「大禹那個時候的滹沱河比現在又寬又大。王翦率領着秦國的「上地兵」，上地兵也不知道是怎樣一種兵，出了井陘口——那便是現在的娘子關到了這些山地。秦國的兵是如何利害呀，土黃色的牛皮製成橢圓形，披在肩膀上，心上和大腿上，走起路來，兩邊歪拉着，披着長頭髮，一隻鋼鎗，接着一束鮮紅的毛繩，毛繩子長長的。將軍坐在寬寬的戰車上廟宇裏的泥胎一般。牛皮甲上銅瓦磨得透亮，銅盔的頭盔蓋到肩頭，紅襠子特別大，他們

手裏拿着超過人三倍長的銅槍，還跨着真正牛筋的弩弓。

「那就是王翦的車隊了。當然這一帶的老百姓不會見過這樣的舉動。車

是上級兵將。老頭子們，由鄉願領頭，拈着白髮跑到大路旁，而且吩咐老婆子在家裏殺雞煮飯。穿葛布的年青的男人們，遠遠地站在村外看熱鬧。少女們互相扶着肩膀驚异地交頭接耳呆呆地露着傻笑，蹴着黑褐色的赤腳。

「大將軍到了，那就是王翦。車夫用威風的吆喝止住了披了牛皮的六匹馬。王翦聲色不動地，像二郎廟裏的楊戲的扮像，眼珠轉動了。從跪在路旁的白鶴行列般的俯在地上的老毛們身上掃過，一下就钉住正在呆看他的——羣姑娘身上。他的下巴上疏朗的黑鬍鬚拂着，他嘎巴着饑嘴。

「一個高身材長頸子的姑娘，是鄉願的女孩。潭水似的大眼睛，發着嬌的光輝，她的小鼻翼煽動着兩頰絢紅。在右耳上的髮環也抖動起來。她發現了大將軍刺人的目光。

「大將軍吩咐把帳篷架在鄉願的門前。夜裏有人看見大將軍的帳篷裏點着百十支牛脂瓦燈。昏黃的燈頭灑蕩在藍赭色的油煙裏，照亮帳外多臘質的白楊葉子，草木向帳篷裏探着光輝閃爍的眼，雪亮的劍光就在燈影裏閃動着，向帳外的荒草上撒着寒森的影子。

「大將軍的紫紅的臉龐，醉眼迷離地貼緊了那個女人。臉白的面頰，眉頭緊蹙着，口唇半開，她就是那高身材長頸子的少女。大將軍左手撐着寶劍，面前跪着一個褐色白頭髮的鄉願，兩手伸向大將軍。——別的事，據說沒人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露水濃重的草徑上，鋪着碾碎了的鮮草和馬糞，車轍和人的足跡。村子裏扔滿了燒去混了土的五穀。一條山溝裏的草坡上，還冷落的丟着一條年青女人的包頭。山後聽得見女人的哭號，老鄉願站在田埂邊嘆着氣。朝日透過的白霧閃出刀光槍影，山谷回響着人喊和角叫。

「時間過去，老鄉願每天早晨爬到土崗上，在雨季裏，在風天裏，在叢草蟋蟀裏，他順風望遠方，那廣漠的掃着天邊的草原哪，可是女兒沒有消息。野兔們大膽的翻着後腳在山坡上跑。

「一年年的過去，媳婦的頭髮更白，臉相更瘦更老了。兩頰都聳起胡桃紋的樣子。可是他還是天天到土崗子上去。

「並且，他還常常帶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彷彿生成的敏感，

的性質。他不愛笑，有一雙潭水般的眼睛，瘦削的身材，頸子長長的，像他

的姑姑。老鄉愿每出神於這小孩的酷肖的時候，他便眼淚汪汪地抱着孫女。告訴她，她又生了一幅使他老來傷心的薄命相。他老的有些囉嗦了。

「一年年的過去了——沒有人記得是多少年——又有一股大兵出了井陘口，向此地來了。鄉愿聽到風聲，便立刻記起使他十多年來的傷心記憶。他

把初長大的孫女首先帶進山去。驕龍，就是這一帶的山，滿希望找一個人家安置。可是那時候人家很少，到那裏去找呢。他喘息着，爬了一整天，最後從那邊那塊崖爬上了山頂。到上面一看，一片平平的草地被大石崖子包圍着。草生得又肥又高，人一走在裏面，頭髮上都會粘到香香草和三棱草的穗子。手脚一撞，牠便發出甜香味。

「老頭子大大喜歡了，他吩咐孫女兒藏在草裏，用老得顫抖的手，把草編織起來，把孫女封在裏面，以防備野獸侵犯。隨後親親孩子的手，便走下山來。

「他回到家來，已是第二天清早。他漸漸走進村來。使他驚愕的，他彷彿又看見十多年前的光景：露水濃重的草徑上，鋪着碾碎的鮮草和馬糞，車轍和人的足跡。村子裏，滿是鷄毛和扔翻了的五穀。他的老心跳了起來，他急忙趕回自己的家。哈，家呢？草屋倒塌了，成了一堆灰，兒子和媳婦也不見了。那裏去了呢。一個比他更老的老頭子，眼睛已經瞎了，耳朵也聾了，聽在路口的石腳上曬太陽。他叫他摸摸他，他不懂。他只糊糊塗塗說了句，『蒙恬，修長城……把年青人都趕去……我丟不成……』

「他沒有辦法，想哭也哭不出來，記起還保留着餓着肚子的活寶，在山上的草裏，他連氣也不嘆了。他走出村來，一隻小牛，毛茸茸的小東西，瞧伏在山溝裏，大牛不在了，沒有人要牠。小牛望着他動着耳朵，他心裏難過起來。他走過去撫摸牠，小牛流淚了。老頭也放聲哭出來，他親着小牛，把他抱起來。小母牛呢，他想着這小東西是他的孫女兒的好伙伴。那山地上，大牛是拉不上去的。他把小牛抱上了山頂。年成好，雨水多，水草也好，他們一家三口便生活在山上。孫女兒，終日和小牛在潭水邊玩，赤着脚，露着胸膛。她和牛一同長大起來。細白的頸子變成光滑褐色了，口唇也紅了。然而老頭子却每天啜泣著，說他生的和他薄命的姑姑，一模一樣，怕沒有福氣。

(未完待續)

本期撰者

陳岱孫、賀麟及柳無忌諸先生俱是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王靜愚先生最近爲雲南民國日報「元旦增刊」撰「一年來之國內政治」一文，經其略加刪改後，特爲轉載於本期，冀使讀者明瞭一年來國內政治之顯著趨向。

本期啟事一

本刊因近來紙價飛漲，自第三卷起，改訂價目如下：
零售每期一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近已裝訂完妥，每本定價二元，外埠郵費另加五角，各大書局均有經售，第二卷即將裝訂，歡迎預約。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 刷 者 中 央 日 報 社

昆明鳳翥街一號

總 經 售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房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分 售 全 國 各 書 局

價目零售壹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凉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尚義街三號